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研究

闫庆生 黄正林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巩固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边区的农村经济,使农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使边区的阶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既满足了群众自给的需要,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也为边区政府提供了财政收入,为边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边区农村经济之所以得到发展,其原因是边区农村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边区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农村经济 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下文简称边区)是“缩毂华北与西北的战略支点”,“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它是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防”。正因为边区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它的巩固与发展就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前途和命运。而在巩固和发展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发展农村经济又是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在八年抗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页。

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1943年1月),《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总论》(以下简称《总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84页。

战中,边区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使边区的农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在以往的边区经济史研究中,学人对边区农村经济尚未做专题论述,故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粗浅的研究,不敢有补苴漏之望,只求抛砖引玉,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抗战前边区农村经济现状

抗日战争前,由于长期的封建剥削和战争的破坏,边区的农村经济凋敝不堪。由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着统治地位,边区农村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土地集中普遍存在。如绥德辛店区延家岔乡有农户 232 户,耕地 2923 垧(每垧约 3 亩),而 14 户地主占有耕地 1934 垧,占 66%;在陇东镇原王原区四乡有耕地 13069 亩,两家地主就占有土地 7400 亩,占 56.6%。随着土地兼并,自耕农的土地渐渐减少,1933 年,绥德佃农土地减少了 1/6,农民把 60% 的土地押出。无地或少地农民承受着高额地租的压迫剥削。“在陕西农村中,每户有地十亩以下的自耕贫农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三十(据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之统计),这些农民因自己田地不够耕种,必须向地主租田。陕西田租甚高,有所谓五五、四六、三七、二八数种……普通佃租都在五五以上,大多数的农民,在交纳佃租以后,所剩无几,有时竟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边区农村金融枯竭,农民又受到高利贷的压迫和剥削,如在绥德“最可赚钱的事业第一便是高利贷。这里借钱最低月利三分,最高五分。也有一年

《社会政策》(1943 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人民生活》(以下简称《人民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3—14 页。

丽水:《陕西绥德县鹅峁峪村的借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年报》1934 年第 2 期。

左健之:《从物价高涨说到抗战中的民生问题》,《解放》第 97 期,1940 年 1 月 30 日。

借一元还两元的,俗名‘一年滚’。”有的地方贫雇农所负担的高利贷占他们全年总收入的45%—85%。农民还要受到苛捐杂税的剥削,据调查,抗战前延安每年固定的捐税有洋烟税、白地稅、警察捐、维持费、灯头捐、印花稅、修城费、驴驮捐、羊稅、血稅、剥皮稅、羊毛稅、契稅等,临时捐稅名目繁多,两项总计在40种以上。加上军阀拉丁、拉畜,官府拉差,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如时人所言:“沿途无日不见陕人夫携妻,母携子,肩负其生活所必需之简单物品,仆仆道上,面有忧色,询之,则皆家中颇有田亩,可称小康者,盖不胜捐稅指派之累,羈押捕打之苦,将其田契贴诸城隍庙或县政府前,扶老携幼,离乡以去。”农村手工业也遭到巨大破坏,当时边区的“工业是非常落后的,民间仅有一些小手工作坊和盐池炭窑,农村家庭纺织业也因外来纱布的大量涌入而消声匿迹。可以说,一切日用品都是仰赖外间输入的。”由此可以看出抗战前边区农村经济遭到了巨大破坏,处于不发展状态。尽管在土地革命时期,边区已经建立起苏维埃政权,部分地区已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得到了土地,但农村经济并没有得到恢复。总之,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十分落后的地区。

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成为边区建设中最迫切的任务。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广泛的开展边区经济建设,是边区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这首先就是为了使边区由半自给自足迅速走向完全自给自足,更加

观山:《陕北唯一“杨家沟马家”大地主》,《新中华杂志》1934年第2卷第16期。

《对玉家湾村在苏维埃时期土地斗争的调查》,《人民生活》,第6页。

南汉宸:《复安塞党委的一封信》(1941年9月26日),《人民生活》,第15—16页。

何挺杰:《陕西农村之破产及趋势》,《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1933年8月。

《边区工业的发展》,1944年5月1日《解放日报》。

有保障长期抗战军队的供给,更进一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这也就是为了更高度的发展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所必不可少的的基本条件。必须指出:没有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边区的巩固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中,最主要的是发展农村经济。这是因为,陕甘宁边区是一块农村抗日根据地,其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在当时的条件下,抗日战争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粮食、布匹和其它物资,主要来源于农村各项生产。可见,在边区经济建设中能否坚持以农业生产为主,能否使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它直接关系到根据地建设的成败,也关系到根据地的命运和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在抗战初期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明确提出要发展农村经济,指出要“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边区愈加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西北局在《关于1942年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在经济建设上,必须用全力贯彻以农业第一的发展的私人经济的方针,自给自足的经济是实现长期抗战供给的保障,人民生活的提高,最基本的就是依靠于发展边区人民经济,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依靠发展农业生产……为此必须充分准备春耕,及时办理农贷,保证乡村一切工作做到不违农时,并采取有效办法,组织农民在适当地区继续开荒与发展水利,提高农民生产热忱,调剂耕牛、籽种、农具等,都必须立即具体计划执行。”由此可见,边区对农村经济建设是十分重视的,而且明确指出发展农村经济是边区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

《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1940年11月12日),《总论》第134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

《关于1942年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1941年12月25日),《总论》,第160页。

二、边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及成效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减租减息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陕甘宁根据地不同于其它根据地,他是在原苏维埃的基础上建立的,有一部分地区进行过土地革命,推翻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有一部分地区未经过土地革命,地主的土地没有被分配。1939年4月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保护边区人民由土地改革所得之利益。”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重申:“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家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给以合理的调整。”可以看出,减租减息主要是在未分配土地的地区进行。

抗战时期减租减息倡导于1937年,但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原因,直到1941年绝大多数地区的减租减息只停留在宣传阶段,并未彻底实施。随着抗战进入最困难阶段,为调动广大农民参加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1942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抗日根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336页。

参看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载《经济研究所集刊》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积极性；又必须保障地主、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决定》为减租减息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为了使减租减息有法律依据，12月，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对边区存在的各种地租的减租额作了详细的规定：定租的减租率不得低于二五；活租按原租额减25%—40%，减租后，出租人所得最多不得超过收获量的30%；伙租按原租额减10%—20%，减租之后出租人所得最多不得超过40%；安庄稼按原地租额减10%—20%，减租之后出租人所得最多不得超过45%。同时，部分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如绥德分区按丰年、平年、次平年、歉年、荒年5种年成规定出不同减免办法(见表1)。

表1 绥德分区减租额统计

减租率 租佃形式 年景	定租	活租	伙种	安庄稼
丰年	25%	40%	20%	10%
平年	40%	50%	20%	10%
次平年	50%	50%	70%	20%
歉年	70%	60%	40%	30%
荒年	100%	100%	70%	50%

资料来源：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经济研究所集刊》第7辑。

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复印件藏庆阳地区档案馆，目录号23，卷宗号274。

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复印件藏庆阳地区档案馆，目录号23，卷宗号304。伙租即出租人除土地外，还出部分生产工具，牛驴等畜力，肥料和种子，收获物(粮食、柴草)根据投入多少分成。安庄稼即地主要供给承租人全部生产工具，给窑(房)住，借给粮吃(收获后只还本)，收获物对半分。

根据边区政府的政策和法律,1943年各地普遍进行了群众性的减租运动。如绥德分区绥德县6个区、米脂县3个区、子洲县5个区、清涧3个半乡减了租,勾欠租31732.82石,退租1842.73石。陇东分区庆阳县6个乡、合水县6个乡、镇原县21个乡减了租,勾欠1939年以前的地租1879.24石,减租2202.14石,地主退租189.14石。1943年10月,针对前阶段减租减息存在的问题和抗日战争发展的形势,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指出“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要求根据地各级政府“检查减租政策实行情况”,把群众组织起来,实行彻底减租。因此,1943年10月至1945年8月边区发动群众,展开了彻底的减租查租,其方法是组织农民开斗争会。斗争会的内容是:(1)退租,退出地主长算的租子。(2)勾账,免去过去的欠租。(3)换约,减租之后重新立约。(4)翻地,把地主收回的土地退给佃户。斗争会长了佃户的志气,减了地主的威风,使得过去不敢减租或明减暗不减的地区彻底减了租。如绥德四十里铺艾家沟,有地主8户,租地108垧,原租为270石,1943年只收132石,仅占49%,较原租减少51%;活租土地246垧,原租53石,1943年只收租30石,减少了38%;伙种土地17.5垧,收租5石,较过去减少40%;安庄稼土地34垧,收获52石,只分一半,减少了49%。赤水县二区一乡1943年11月2日开了减租斗争会,会后7天就有15家佃户的460亩租地立了新约,减了12石9升租子,废除陈租130余石。1943年冬季,

《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以下简称《农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页。

《陇东租佃情况》(1944年),《农业》,第323页。

贾拓夫:《关于边区土地政策问题的报告》(1945年3月15日),《农业》,第365页。

《关于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情形》(1944年2月),《农业》,第369页。

合水县各区算了 516 户佃户、117 户地主的减租账,换了 710 张租约,地主退给佃户多收的租子 22 石 9 斗 1 升。1943 年末减租的 25 个乡,1944 年进行了减租调查,使其彻底减租。1944 年,关中分区配合春耕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减租查租,新正全县佃户原定租额每年为 1130.525 石,经减租查租后,减掉 689.22 石。该县三区共有佃户 417 户,地主 87 户,租地 6385.5 亩,原租额 652.59 石,新订租额 262.67 石,减去 389.92 石。新宁县各区地主从 1941 年至 1943 年,共高装佃户租子 2163.965 石,经过减租斗争,退现粮 499.029 石,剩余应退租用 30 头牛、4 头驴、58 只羊、当地 1338.5 亩顶替。该县一、三、四、五区共订新租约 562 张,抽旧约 14 张。经过查租清算,地主以土地折价顶替退租,使一部分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如绥德分区彻底减租的地区地主土地的 50%—80% 转入农民手中。庆阳县三户大地主原有土地 29600 亩,1943 年减租后只剩下 5650 亩,比原来减少了 80.9%。

(二)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可耕地 3000 多万亩,抗战爆发的 1937 年耕地面积为 8626006 亩,仅占可耕地面积的 25% 左右,即边区有 2000 多万亩土地可供开垦,这是一个潜在的农业资源,如果土地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对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意义十分重大。为了鼓励移民和边区群众开荒,政府规定公荒谁开归谁所有,3 年免收公粮;私荒如果地主不开,农民可以自由开垦,并免交 3

《合水县减租工作总结》(1944 年 6 月),《农业》,第 402—403 页。

《关中 1944 年春耕前减租工作的报告》,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之九《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内部资料),1992 年 2 月,第 223 页。

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1 页。

马兴文:《抗日战争时期陇东的减租减息运动》,《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 44—45 页。

年地租,3年后依照租佃条例交租,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对移民、难民垦荒而无力购买耕牛、农具、籽种的,由政府给予农贷帮助。因此,抗战期间,边区的耕地面积得到了大幅度增长(见表2)。1945年的耕地面积比1937年增加了563万亩,增长指数为165.3,人均耕地面积达到了8.9亩。

表2 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土地增加情况

年代	耕地面积 (万亩)	耕地增加 指数	边区总 人口	人均耕地 (亩)
1937	862.6	100.0		
1938	989.4	114.7		
1939	1007.6	116.8		
1940	1174.2	136.1		
1941	1213.2	140.6		
1942	1241.3	143.9	1362254	9.1
1943	1338.7	155.2	1414786	9.5
1944	1338.7	155.2	1448818	9.3
1945	1425.6	165.3	1595065	8.9

资料来源:王政新:《陕甘宁边区的粮食工作》,《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70—284页。耕地增加指数(以1937年为100)为笔者所加。

(三) 推广植棉

边区东部沿黄河的延川、延长、固临等地适宜种植棉花。据史载,在清末民初这里植棉最盛,年植棉8万亩,皮棉产量在60万斤

左右,可自给约 1/3。及至二三十年代,随着外来洋纱洋布的进入,这里植棉遭到破坏,甚至连棉种也很少有了。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国民党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外面的棉纱、棉花和布匹进不来,这就要求边区的棉纱、棉花等必须自给。因此,提倡和扩大植棉成为边区一项重要的农业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第三项农业政策就是推广植棉。”抗战期间,为推广植棉,边区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1940年12月11日颁布了《关于推广棉麻的训令》,对于棉农的有关优惠政策规定如下:(1)愿种棉而无棉籽的,由建设厅贱价卖给或借给,收了新籽后还。(2)如果一亩地收不到10斤棉花,由政府弥补损失;如果10斤棉花的价钱,少于种粮食收入的价钱,由政府赔偿;如果棉花卖不出去,由政府承买。(3)在3年以内,棉田免收农业税或救国公粮。同年,在《关于本年度经济建设计划的决定》中又明确规定:“在适宜种棉区域,动员农户增种棉五万亩,由政府发给农户棉种,秋收后由政府购置轧花机帮助农民合作轧花,保证农户如因种棉受有损失,政府弥补之。”对于植棉,政府在农贷上给予极大的优惠,在1943年1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奖励植棉贷款条例》中规定:“本贷款为奖励植棉起见,完全不收利息”;“对于植棉贷款,各借户如因灾荒或受意外损失时,则可按受灾程度之大小,酌予延期归还或分期归还。必需时尚可请求政府准予减免。”边区政府颁布的这些优惠政策对于推广

高自立:《边区植棉发展概况及今后推广方向》(1944年2月10日),《农业》,第592—601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70页。

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复印件藏庆阳地区档案馆,目录号23,卷宗号112。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第105页。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金融》(以下简称《金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429页。

植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边区推广植棉始于1939年,首先把重点放在东部黄河沿岸的延川、延长、固临等地,当年就植棉3767亩。由于1940年至1943年边区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使东部旧棉区恢复和发展很快,几乎村村都植棉,家家有棉田。1940年至1943年棉田面积不断扩大,分别为15177亩、39987亩、94405亩、150473亩,“东三县的棉花面积将近占了边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产量占三分之二以上”。边区一面在东部恢复植棉,一面在关中、陇东等地试种棉花。如绥德分区1943年植棉41254亩,收棉482115斤。边区在陇东、关中、绥德植棉获得成功后,1944年就决定把推广植棉的重心由旧棉区转移到新棉区,对旧棉区只采取措施提高亩产量,不再扩大面积,而在陇东、绥德、关中地区迅速扩大植棉面积。如1944年陇东分区植棉3万亩,收花30余万斤,亩数和产量分别比上年增加了37.5倍和30倍。由于新棉区植棉迅速推广,使边区棉田面积于1944年扩大到295178亩,1945年增加到350000亩。

边区推广植棉是为了达到棉花自给。据估计,边区棉花年需求量约350万斤,这也是边区植棉的奋斗目标。1939年推广植

《陕甘宁边区五年来(1939—1943)植棉面积比较》,《农业》,第87页。

高自立:《边区植棉发展概况及今后推广方向》(1944年2月10日),《农业》,第592—601页。

高自立:《边区植棉发展概况及今后推广方向》(1944年2月10日),《农业》,第592—601页。

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之一《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内部资料),1993年,第128页。

《三十三年(1944年)二十七县(植棉)统计》,《农业》,第87页。

高自立:《边区植棉发展概况及今后推广方向》(1944年2月10日),《农业》,第592—601页。

棉时,所收棉花只能供给 1%。以后随着棉亩和产量增加,自给率不断提高。1941 年至 1944 年边区棉花产量分别为 508131 斤、1403646 斤、2096995 斤和 3044865 斤,自给率分别为 14.5%、40.1%、59.9%和 87%,可见推广植棉的成绩是显著的。

(四)兴修农田水利

边区处于西北干旱地区,有“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之称,农业生产对天气的依赖性很大。为了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边区利用小河、小溪、地下水、山洪等发展农田水利。

(1)山洪冲下来的泥土淤漫、沉淀在沙滩上,经过改良可以成为肥沃的农田,称之为水漫地。边区可以改良修成水漫地的主要在三边分区,定边县有 162 万亩,靖边有数万亩,即三边有 170 万亩土地可修筑成水漫地。边区兴修水漫地始于 1943 年,当年修成当年见效,在靖边的镇靖区、镇罗区及杨桥畔等地修成水漫地 20000 亩,可收细粮 6000 石。在定边修筑水漫地 40000 多亩,有 30000 多亩已种植,可增产细粮 4500 石。

(2)为了使已耕地中的泥土和肥料不被山洪冲走,在低洼处筑坝以阻止山洪泥土,使洪水中的泥土沉淀在原来耕地的较低处,形成一块肥沃的小平地,叫做埝地。这是关中的一种改良土质、增产粮食的水土保持方法,这种方法首先在赤水县进行,1939 年至 1941 年修筑埝地 4000 多亩,1942 年又修成 3260 亩,这 7260 亩埝

高自立:《边区植棉发展概况及今后推广方向》(1944 年 2 月 10 日),《农业》,第 592—601 页。

根据《农业》第 87 页有关统计数据整理,棉花自给率为笔者所算。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水利事业》(1944 年 2 月 15 日),《农业》,第 711—731 页。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水利事业》(1944 年 2 月 15 日),《农业》,第 711—731 页。

地,1943年多产细粮1089石。此后,关中把修筑埝地的方法和经验推广到其它县,1943年春耕时已修成埝地1350.6亩,其中赤水510亩,新宁37亩,淳耀274亩,新正119.3亩,东区410.3亩。同年耕种埝地8610.6亩,比原耕地增收细粮1291.59石。

(3)流水灌溉。边区修建的河渠流水灌溉工程主要有杨桥畔水渠、裴庄水渠、子长水渠等。三边分区靖边县杨桥畔水利工程在抗战前就有,1939年边区政府重新修建,1943年夏竣工。水渠长5里,流量为每秒1立方米,可灌溉农田10080亩,可增收细粮10080石。裴庄水渠位于延安城西20里,1939年8月动工,1940年4月竣工,完成70米长尺碎石坎一座,6公里长干渠一道,可灌农田1500亩。但于6月30日被洪水冲垮。10月动工复修,1941年4月完工。这条水渠几经修复,1943年春,可灌溉农田1072.5亩。子长县的子长渠1942年6月兴工,1943年5月竣工,渠长5.3公里,可灌溉农田800亩。同时,延属分区在1943年还修建小型水利工程多处,可灌地1738亩。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边区修成水地13647.6亩,可增收细粮13647.6石。经过边区建设厅专业技术人员的试测,边区许多河流两岸均可修渠灌溉,如葫芦河沿岸可灌溉5500亩,安定杨家园子阳川可灌溉1200亩等。另外,边区还鼓励凿井、打窖灌溉农田,增收粮食。如1943年葭县打水窖10000多个。总之,通过流水灌溉、井水灌溉,边区水地逐年增加,1940年至1943年水地分别为23558亩、25615亩、27572亩、41109亩。

以上数据均引自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水利事业》(1944年2月15日),《农业》,第711—731页。

《陕甘宁边区四年来水地面积比较》,《农业》,第710页。

(五) 举办农业贷款

边区举办农贷始于 1938 年,当时边区政府商请陕西省合作委员会从中国农民银行拨发给边区农贷 20 万元(法币),发放给延安 45600 元,安塞 27200 元,志丹 16000 元,靖边 36000 元,定边 26000 元,甘泉 16000 元,延长 26000 元,富县 16800 元。1939 年,随着国民党反共事件迭起,国民政府对边区的农贷中断了。1941 年 1 月,边区政府废止法币在边区流通过后,决定发行边币。边币成为边区通货本位后,为了保证开垦荒地、推广植棉、兴修水利等政策的贯彻落实,边区政府决定举办农贷。为了发放农贷,边区政府组成了农贷管理机构和发放机构,并制定了农贷发放的措施和办法。1941 年 12 月 15 日,边区组成了农贷委员会,各县也相继成立农贷委员会,负责管理农贷。受边区政府的委托,边区银行在各县成立了农贷办事处,专门发放农贷。基层以村为单位组成农贷小组,负责农贷的发放,检查农贷用途和督促归还。为保障农贷推行和农贷作用的发挥,边区在 1942 年至 1943 年先后颁布了《边区农贷的基本任务和目前实施办法》、《陕甘宁边区三十二年度农贷实施办法》、《农贷小组(或生产小组)暂时组织办法(草案)》、《陕甘宁边区奖励植棉贷款条例》、《陕甘宁边区青苗贷款条例》等。这些机构的设立,办法和条例的颁布,推动了边区农贷事业的发展。据统计,1941 年至 1945 年边区农贷发放分别为 23.5 万元、800 万元、2780 万元、10000 万元、59900 万元。

边区农贷在各地得到了实施,并收到了显著效果。1942 年延属东区延长、延川、固临三县发放植棉贷款 963650 元,借款户

边区银行:《农贷问题》(1943 年),《金融》,第 446 页。

转引自郝琦《论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农业贷款及其经验》,载《延安大学学报》1997 年第 3 期。1941—1943 年为边币,1944—1945 年为流通券——引者注。

12120户,占三县户数的50%。因贷款而新增植的棉花面积达51574亩,可增收棉花872185斤。同年,边区给各县发放了青苗贷款,延安71468元,甘泉100420元,安塞120393元,子长93644元,志丹122495元,富县70904元,延长77860元,延川24080元。1943年,延安、甘泉、安塞、子长、志丹、富县、延市、南泥湾、排庄、蒙民委员会贷款1541543元,群众自筹资金1036921元,购买耕牛2672头,农具4980件,新增耕地36260亩,增加粮食26107.2石。三边分区发放农贷150万元,其中定边40万元,靖边50万元,盐池20元,吴旗40万元,共购置农具1014件,耕牛192头,驴35头,扩大耕地25864亩。陇东分区发放农贷240万元,青苗贷款40万元,增开荒地6116亩。由此可见,农贷起到了推动农业发展的作用。

(六) 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1940年,边区建立了光华农场,主要进行农牧业科学试验,下设农艺组、园艺组和畜牧兽医组。农艺组选育的优良品种有:(1)狼尾谷,具有秆坚硬、抗粟螟强、小穗毛长、雀不吃的特点,比边区较好的干捞饭谷产量高出10%,1944年在边区推广面积达到10180亩;(2)金黄后玉米(刘少奇同志引进的),亩产一石五斗,比本地玉米高出一倍以上;(3)彭县黄皮马铃薯,亩产1462斤,比本地的紫皮马铃薯高34.9%;美国白皮马铃薯,亩产1371斤;(4)老黑豆,有耐旱颗大的特点,比本地丰产大豆亩产高9.1%。园艺

边区银行:《一九四二年边区农贷的初步总结》(1942年11月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复印件藏庆阳地区档案馆,目录号23,卷宗号288。

三边专署:《农贷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9月3日),《金融》,第427—428页。

陇东分区:《一九四三年上半年经济建设工作总结报告》,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之十《陇东的经济建设》(内部资料),1996年,第254页。

《光华农场过去工作总结》(估计1944年),《农业》,第745—746页。

组引进的优良品种主要有：(1) 蔬菜类，引进试种成功的有西红柿、葱头、球茎甘蓝、石柏、生菜、冬苋菜、甜玉米、油菜、雪里蕻、菜心、芥蓝、茼蒿、冬瓜、苦瓜、丝瓜等十多个品种，选出粉红色西红柿、黄金后西红柿、蕃茄皇、法国菜豆、四季菜豆、球茎甘蓝、美国紫国茄、露八分萝卜等数十个优良品种，在边区机关、部队、学校、乡村广泛种植；(2) 瓜果类，引进良种成功的有小糖瓜、甘露西瓜、黄金梨瓜和草莓浆果等，这些优良品种的引进，补充了边区的甜食来源；(3) 果树类，边区原只有沙果，农场引进了苹果、梨和葡萄，光苹果的品种就有国光、红玉、倭锦、黄元帅等，这些优良品种在边区的一部分地区得到推广。

边区耕作方法上进行的改良主要包括耕地、施肥、除草等方面。通过比较(参见表3)可以看出，运用改良耕作方法后每垧耕地产量是运用原耕作方法收获量的3倍，可见，改良耕作方法是增加粮食产量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边区政府要求普遍地改良耕作方法，在边区农村形成了一个深耕地、多积肥、多除草的群众运动，逐渐改变了过去广种薄收粗放经营的传统耕作方法。就除草而言，边区多数地区原来耕作没有除草的习惯，经边区改良耕作方法动员后，锄草耕地越来越多。1943年，曲子县264711亩秋田中，有45132亩锄草3次，占17%，68620亩除草2次，占25.9%，124931亩锄草1次，占47.3%。镇原县62047亩谷地，锄草4次的有874亩，占1.4%，锄3次的有15300亩，约占25%；9270亩高粱地，锄草4次的248亩，占3%弱，锄3次的2380亩，占26%弱。吴旗县24000亩麦田、10万亩荞麦均锄草1次，10万亩糜子锄2次，6万亩谷地和12万亩杂田锄3次。淳耀县36605亩麦地、

陈凌风、达时：《回忆陕甘宁边区光华农场》，载《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221页。

28088亩秋地锄草1次,约占77%。庆阳、合水、镇原的麦子锄草的占50%—60%。

表3 原耕作方法与改良后耕作方法的比较

项 目	原 耕 作 方 法	改 良 后 耕 作 方 法
耕地次数	种时耕1次	种前耕1次,种时耕1次
耕地深度	镟挖7寸,牛耕5寸	镟挖1尺,牛耕7寸
施 肥	每垧地施肥10袋	每垧地施肥50袋
锄 草	2次	4次
收 获 量	每垧收谷8斗,草300斤	每垧收谷3石,草800斤

资料来源:《边区农业统计表(1940—1943年)》(1944年),《农业》,第732页。

(七)组织农村劳动力

首先是把农村分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抗战时期边区有各种各样的劳动组,如劳动互助社、义务耕田队、妇女生产组、儿童杂务队、变工队、扎工队、锄草队等,把分散的劳动力组织在一起。如1939年边区参加劳动互助社的有89982人,参加义务耕田队的有66347人,参加妇女生产组的有53126人,参加儿童杂务队的有39708人,总计249163人。1943年,边区有338760个劳动力,其中有81128个劳动力组织在劳动合作社之内,占24%。夏耘、秋收中分别有10%—15%、40%、30%的劳动力被组织在各种劳动组织之内。1944年,边区参加劳动互助组织的农民达21万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改良农作问题》(1944年),《农业》,第739—740页。

边区建设厅农牧科:《一九三九年农业生产总结报告》,《农业》,第424页。

史敬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57页。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216页。

人,占总劳动力的45%。边区各种劳动组织把农村分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巨大作用:(1)实行劳动互助提高了劳动生产率;(2)实行劳动互助有效地使用人力、畜力,减少浪费,增加有效劳动时间;(3)把分散的社会劳动力组织到生产中来,便于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学习新的耕作方法,完成生产任务;(4)在地少人多的地区实行劳动互助组织,可以节省劳动力和发展农村副业;(5)把劳动力组织起来便于政治教育和政治动员,为抗日战争服务。

其次是组织和安置移民,调剂和增加劳动力。边区的移难民工作,一是发动地少人多地区的农民到地多人少的地区开荒,二是安置外来难民。1942年以前边区移民、难民是自流的,高干会议后边区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据不完全统计,边区1941年移民7855户,约20740人;1942年移民5056户,约12431人;1943年移民9863户,约30447人。在1943年的移民中,绥德分区移出1836户,约4961人,其中劳动力2529个,占移出人口的51%;延属分区安置移难民3089户,约9414人,其中劳动力3578个,占安置人口的38%;关中分区安置4146户,12736人,其中劳动力约4593个,占安置人口的36.1%;陇东分区安置529户,2280人,其中劳动力约700个,占安置人口的30.7%;三边分区安置273户,1039人,其中劳动力约300个,占安置人口的28.9%。1944年安置移民6813户,22197人。为做好安置移民工作,使移民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边区先后颁布《陕甘宁边区移民垦殖暂行办法》(1940年)和《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1943年3

《各项建设大有进步》,1944年12月27日《解放日报》。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农业》,第643页。

《陕甘宁边区农业》(1945年),《农业》,第645页。

月1日),调动了移难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成为边区农业生产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边区曾做过这样的估计,1941年至1943年安置的6万移民中有18300多个劳动力,每个劳动力耕种20亩,可扩大耕地面积366000亩,每亩收粗粮2斗,每年可收粮食732000石,并认为“这个数目的估计,不论耕地数量与收获量上,都还是较低的估计”。

其三是改造二流子。改造二流子是边区的社会政策之一,1941年“五一”施政纲领指出:“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①1937年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时边区约有二流子3万余人。1939年延安、华池率先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劳动,取得经验后在全边区推广,到1942年底,约有2/3的二流子经改造或自觉地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43年边区发动了改造二流子的群众运动,对9554名二流子进行改造,年底有58.8%的二流子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二流子的改造对边区农村经济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1943年,安塞城区转变的43个二流子,种地939亩,约产粮124石;陇东分区转变的732个二流子,开荒2990亩;甘泉转变的132个二流子,开荒275亩。

(八)发展畜牧业

林伯渠在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牲畜是边区最重要的富源,贫中富农的分界不决定于土地多少而决定于有无牲畜。如一个人一年掏地六垧,一牛则可掏地二十垧,羊可剪毛,畜粪可肥地。所以帮助贫农发展牲畜,应该是繁荣农村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农业》,第644页。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4页。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二流子的改造》(1944年),《农业》,第687—691页。

的要政之一。”正因为这样,边区采取措施发展畜牧业:(1)推广牧草种植,主要是种植苜蓿、修草原、割秋草等;(2)加强防疫,光华农场研究试制成功牛瘟疫苗和血清,对骡马的疝痛和牲畜的疥癣病都研制出特效的治疗方法;(3)禁杀母畜,严禁母畜出口;(4)改良畜种,经杂交改良的有绥米驴、秦川牛,有体格大、体质好、适应边区粗放饲养的特点。改良的滩羊毛质细软,每羊年产毛2斤以上。这些措施在边区得到较为成功的推广,极大地推动了边区畜牧业的发展。边区的牛、驴、羊数目迅速增加(参见表4),骡马、骆驼等发展也很快,如1938年有骡马1468匹,骆驼1254峰,1944年分别增加到12万余匹和11780峰。畜牧业的发展为边区农业、运输业和纺织业、制革业的发展提供了畜力和原料。

表4 1939—1944年边区牛、驴、羊发展统计

年 代	牛 (头)		驴 (头)		羊 (只)	
	数 量	增加指数	数 量	增加指数	数 量	增加指数
1939	150892	100	124935	100	1171366	100
1940	193238	128.1	125054	100.1	1723037	147.1
1941	202914	134.5	137001	109.7	1714205	146.3
1942	209684	139.0	167966	134.4	1873120	160.0
1943	214683	142.3	169404	135.6	1923163	164.2
1944	223058	147.8	180682	144.6	1954756	166.9

资料来源:《边区农业统计表(1939—1943)》,《农业》,第98页,指数为笔者所加。

总之,抗战时期,边区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192页。

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7年),《农业》,第98页。

成效,边区粮食产量的逐年增加就能说明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从表5可看出,粮食总产量最高的1944年比1937年多70.1万石。1937年人均粮食0.86石,1944年达到1.25石,人均增加粮食0.4石。

表5 1937—1945年边区粮食总产量统计

年 代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产量(万石)	111.6	121.1	175.4	152.6	145.5	148.3	181.2	181.7	160.0

资料来源:王政新:《陕甘宁边区的粮食工作》,《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270—284页。

三、边区农村的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边区的农村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也发展起来,构成了边区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一)边区的农村手工业

边区农村手工业以合作社和家庭个体生产为主要经营方式。手工业合作社是在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人民大众联合起来的集体经济实体,它是由群众集股或做份子形成的,是一种合作制经济。边区手工业合作社发轫于1937年。1939年4月,国际友人艾黎访问延安时提议,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在延安设立事务所,推广合作社,由是边区的手工业合作社发展起来,当年即成立合作社10个,股金11315元;1940年发展到17个,股金64087元,每月平均生产总值34470元;1941年6月发展到30个,股金613117元(内有未交足股金168000元),政府贷款198870

元,合计股金 811987 元。1942 年 10 月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 50 个,股金 2491600 元,每月生产总值 230 余万元。(缺 1943 年资料)1944 年有手工业合作社 114 个,占边区合作社总数的 18%;1945 年,抗战结束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达到 591 个,占边区合作社总数的 67%,每月生产总值达 3222086525 元(边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纺织、服装、食品、化学、建筑、造纸等行业。各个行业又有不同的门类,如纺织业有毛织、棉毛纺织、丝织等社;服装业有被服、制鞋、制毡、皮毛等社。在各个手工业行业中,以纺织业最突出,1940 年有纺织社 7 家,占手工业合作社的 39.5%,1941 年有纺织社 21 家,占手工业合作社的 80%。

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带动了家庭个体手工业的发展,边区的农村个体手工业行业比较齐全,有毡坊、鞋铺、成衣铺、毛口袋坊、皮坊、染坊、木工坊、铁铺、掌铺、铜匠铺、麻绳铺、粉坊、油坊、酒坊、豆腐坊、磨坊、纸烟坊等 20 多个行业。这些手工业作坊普遍存在于边区的市镇和农村。边区的农村个体手工业经营有作坊经营和家庭副业经营两种方式。作坊经营者一般脱离农业生产劳动,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主要分布在乡镇和县城之中,有自己的铺面,即作坊。家庭副业经营者大多数是农民,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它亦有两种生产方式:一是在农村走

《生产合作社报告材料》(1941 年 8 月),《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工业交通》(以下简称《工业交通》),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78—47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东北书店 1948 年版,第 786 页。

边区政府研究室:《边区合作社八年发展概况》(1944 年 8 月),《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七编《互助合作》(以下简称《互助合作》),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95 页。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延安事务所工作概况与今后计划的报告》(1946 年),《工业交通》,第 485—486 页。

《关于边区经济建设之报告书》(1941 年 10 月 4 日),《工业交通》,第 481—482 页。

家串户,替乡村农户干活,几乎没有自己出资生产的产品出售;一种是在自己家里从事手工业生产,用自己的资本、原料生产出成品拿到集市上出售。1942年,据陇东分区、延川、固临、酃县、吴堡、盐池、定边、靖边、延安等14个县市的调查统计,共有个体手工业作坊399家,从业人数656人;1943年发展到作坊1108家,增长了2.8倍,从业人数2047人,增长了3.1倍。1944年三边有作坊506家,1426人,绥德有作坊599家,964人;陇东有作坊302家,517人。边区的农村手工业以家庭妇女纺织业为大宗。1942年至1944年家庭妇女纺织业发展状况如表6所示,3年中参加纺织的妇女分别占边区总人口(以150万计)的5.8%、11.5%、14.2%,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表6 1942—1944年边区家庭妇女纺织业发展状况统计

年 份	纺 纱			织 布		
	纺妇(人)	纺车(架)	纺纱(斤)	织妇(人)	织机(架)	织布(匹)
1942	75000	68000	785831	13500	12000	14158
1943	133457	120255	835849.9	39038	19283	35451
1944	152645	145683	1660203	60548	23095	114497

资料来源:《1942年建设厅工作总结报告》,第553页。

边区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在边区工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满足了边区群众生活的自给需要,如1943年边区共生产大布104302匹,其中合作社织布6000匹,家庭及私营工厂织布65334匹,占63.4%;另一方面对边区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大的

建设厅:《一九四三年工业统计表》(1944年4月1日),《工业交通》,第596页。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8年2月19日),《工业交通》,第597页。

推动作用。边区农业生产工具如犁、铧、耨、锄头、镰刀、铁锹、镢头等,运输业的大车、鞍架、皮革、口袋、牲口踢掌等,以及在边区各地集市上出售的各种工业品,绝大多数出自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因此,如果没有边区手工业的发展,就很难有边区农业、商业和运输业的发展。

(二) 边区的农村商业

抗战时期边区的商业政策是:“对内自由贸易,奖励发展私人商业。对外调剂输输出,鼓励土产输出及无代用品的必需品输入;限制迷信品、奢侈品的输入,及边区自给不足的必需品输出;发展商业合作,便利人民交换,抵制商业资本的过分剥削。”在这一基本政策之下,边区的农村商业繁荣起来,主要表现在农村消费合作社、集市的建立和发展,骡马交流大会的定期举行。

边区消费合作社创办于苏维埃时期,苏维埃政府针对根据地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有的地方买东西往往走上百十里路,农民剩余的农产品没人收购的现状,决定在根据地的县、区、乡创办消费合作社。1937年,边区共有各类消费合作社142个,社员57847人,股金55525.8元,公积金3594.3元,销货额261189元。1938年,为了加强对合作社工作的领导,取消了乡支社,加强了区、县社的力量,使合作社比之苏维埃时期进一步发展壮大(参见表7)。消费合作社是发展边区农村商业贸易的重要环节,它真正起到了供给群众日用品与帮助群众调剂交换的目的,在边区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在农业生产中,合作社每年供给群众犁、

海燕:《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概况》,1941年11月5日《解放日报》。

建设厅:《抗战以来边区合作社发展概况》(1942年5月),《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商业贸易》(以下简称《商业贸易》),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页。

铧、耕牛、籽种等生产资料;在工业生产中又帮助各工厂收购皮革、羊毛等农副产品。如1937年至1939年6月,边区的消费合作社

表7 1938—1942年边区消费合作社发展情况统计

年代	社数(个)	社员数(人)	股金额(元)
1938	127	73342	83958
1939	115	82885	88177
1940	132	123279	200961
1941	151	140218	673070
1942	114	66963	3469447

资料来源:《商业贸易》,第287页;《互助合作》,第140页。说明:1938—1941年1月为法币,1941年2月—1942年为边币。

3年中经营了价值96460000元的日用品,输出价值173400余元的土产品;帮助群众购买铧30890页,牛1605头,麦种643石,谷种173石,麻种105石,棉种14250斤;收购群众剩余产品羊皮5000张,羊毛8000斤,猪羊油1500斤,生铁12000斤。吴旗县金汤区合作社1938年至1943年5月,卖给群众洋布152板,老布3369丈,犁铧895页,棉花150斤;替群众卖出土产羊10010只,羊绒22348斤,羊皮300张,粮食380石,食盐300斤,甘草150斤。合作社的货物比市场的便宜10%—15%,收购农副产品又比市价高出4%—5%。消费合作社还派货郎担子下乡,如金汤区陈丕秀合作社1941年有2付担子,1943年有8付担子,1944年精减为4付,主要是送货下乡和收购土产。吴堡任家沟区合作社

刘景范:《两年来边区合作社工作总结及今后边区合作社的任务》(1939年10月),《商业贸易》,第289—290页。

根据《互助合作》第160—161页有关数字合计。

《实行货郎担子下乡》,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

牛爱彩的货郎担子“主要卖洋火、煮色、碱、针、线、梳子、带子、珠珠、顶针、丝绸……价钱通常比市价低十分之一”，很受边区农村群众特别是妇女的欢迎。货郎担子下乡一方面方便了群众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商业的繁荣。

边区农村商业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农村集市的建立和发展。抗战初期边区就有一些集市，而边区各县区大规模建立集市则是在渡过1942年困难之后，即随着边区经济的复苏，农村集市相继建立。边区的集市主要建立在县城或区、乡所在地，平日，这里有公私商店营业，也有一些手工业作坊，每逢集日，周围农民赶集市，出售农副产品，购买自己所需东西。集市有三天一集的、五天一集的，各集时间互相错开。边区的集市主要分布在人口较多、经济较发达的绥德和关中分区，据不完全统计，绥德有集市43个，关中有22个，足见这两个地区农村商业贸易的繁荣。另外，一些历史资料记录了农村集市的兴旺景象，如安塞四区的真武洞，“五天一集，这一集市，目前已成为安塞商业之中心，以后每集天数的缩短，集内的商店增多，将更趋繁荣”。延安“每逢集日，百货云集”，“一个荒沟忽然成为长二里的华屋高窑，熙来攘往，俨然都会”。陇东的“曲子市与三岔镇都是以逢三、六、九为集期的。每逢集日，附近十数里的群众和一切流动商贩，常是潮涌而来，因此商业交易，顿形活跃。”合水西华池“逢集的日子（五天一集），四面大路上，人群不断的向这里蠕动着，汇集着。各种各样的小摊，街道两旁不知有多少：人群塞满了街头，潮水般的涌来涌去。商店的伙计们忙得

《解决农村供销问题》，1944年7月9日《解放日报》。

《关中分区各县税务局所分布详图》、《绥德分区市镇简略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正文前插页。

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41年2月），《商业贸易》，第399页。

刘葆璋：《曲子、三岔的商业》，1942年3月26日《解放日报》。

连烟都顾不上抽。”久而久之,许多集市发展成为当地农村的商业贸易中心,西华池是最为典型的:1937年西华池“除了两三家连肉也找不到的小饭店外,整条街道还没有十家铺面”,1943年发展成为“有三十三家卖布匹、毛巾等的杂货店,十八家皮货店(卖皮带、牲口鞍子的),五家木器铺,四家铁铺,三个理发店,大小饭馆十六个,三架压面机,镶牙社一个,染房四个,中西诊疗所一个,公私客栈十八个,各种小贩七十五个,全市商店居民在两百户以上”。而且货物的吞吐量也是很大的,据1942年4月份贸易情况统计,“输出方面有:食盐每日平均四万余斤,牛三十二头,驴三十头,羊九十五只;输入方面有:码子布七万六千余丈,三八布二百匹,四十码土布六十匹,四十码青、白洋布二十匹,棉花二二斤,其次火柴、毛巾亦有输入”。

传统的骡马交流大会也反映了边区农村商业贸易的发展。抗战时期,由于农业、工业的繁荣,边区各地一年一度的骡马大会也盛况空前。如定边每年9月召开骡马大会,1943年是在9月15日起会,大会盛况空前:会场右边是马市,大小马约千余匹;东为牛市,犏牛、条牛约六千余头;南边为驼市,有五百之多;会场中心形成西北两条街道,毡、毯、帽、鞋、皮毛、布匹、铜器等,各样小摊,应有尽有。每日参加人数约在15000人以上,商品交易异常发达,蒙古同胞卖了马和牛,换取布匹、糖、茶、铜器和谷米、白面等。

(三)边区的农村运输业

农村运输业的兴盛是抗战时期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特

平野:《西华池繁荣了》,1943年4月27日《解放日报》。

《西华池繁荣了》,1943年4月27日《解放日报》。

平野:《西华池商业发达》,1942年6月12日《解放日报》。

《定边骡马大会盛况空前》,1943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

色。1941年以前,边区农村运输业是自流的,主要是个体脚户,包括4种形式:长脚,靠运输获利为生;短脚,主要从事农业,以运输为副业,多以揽脚贩卖为主;农户脚,利用放青季节驮盐;边区外的长脚,将货物运到边区,再将边区的盐、皮毛、药材等土产运出去。1940年盐荒后,边区重视了盐的运输问题。1941年边区政府和各分区、县都成立了督运委员会,区、乡基层成立了运输大队。1942年边区在《三十一年度交通运输工作计划》中指出:“发展边区交通运输应当针对着发展食盐的运销、粮食和工业原料的运输为中心。”通过“组织运输合作社,协助发展私人运输业,并吸收外来脚户来发展边区的运输力量”。由此,边区以盐运为中心的农村运输业发展起来。特别是高干会后,边区的农村运输业从自由的、流散的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

边区农村运输业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合作社运输队和群众运输队两种形式。合作社运输队是群众按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有较强的组织性。凡是加入合作社运输队的群众至少须认交社股一股,每股不得少于50元,入股的物资也有规定:(1)能运输的牲口;(2)大车、鞍架、口袋等运输工具;(3)粮食或草料;(4)特殊情况下得用货币。边区的运输合作社起步于1942年,当年仅有牲口246头,1943年9月发展到3706头,1944年已达61911头,当年,有运输合作社233个,占边区合作社总数的36.75%,运输合作社遍布边区各县。在资金上,运输合作社的资力已达

建设厅:《三十一年度交通运输工作计划》,《互助合作》,第253页。

《边区人民运输合作社组织办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复印件藏庆阳地区档案馆,目录号23,卷宗号356。

边区政府:《边区的运输事业》(1944年),《互助合作》,第257—258页。

边区政府研究室:《边区合作社八年的发展概况》(1944年8月),《互助合作》,第88页。

876161043元,占边区合作社资产总值的41.21%。1945年7月运输合作社达到317个,占边区合作社的53.63%。

群众运输队是群众按自愿原则结合起来的比较松散的农村运输组织,有朋帮、合伙、变工、捐牲口及带头等多种形式。随着边区合作社运输业的兴起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群众运输组织也发展起来,从1942年至1944年6月农村运输牲口的增加就可以看出来(参见表8)。

表8 1942—1944年边区农村运输用牲口统计

项 目	1942年	1943年	1944年6月
长脚牲口(匹)	17631	20822	
短脚牲口(匹)		27900	34022
合 计(匹)	17631	48722	54227

资料来源: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8年2月19日),《工业交通》,第686页。

农村运输业的发展对边区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就拿运盐一项来说,1938年有7万驮,1939年达19万驮,1940年23万驮,1941年29万驮,1942年24万驮,1943年38万驮。如果没有农村运输业的发展,对外贸易的主要物资盐是运不出去的。同时,边区的粮食、货物运输也大都是靠运输合作社和群众运输队完成的。另外,运输业给农村带来了很高的经济效益。延安南区合作社运输队1943年运盐9536驮,获益边币8583293元,折小

边区政府:《边区的运输事业》(1944年),《互助合作》,第259页。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延安事务所工作概况与今后计划的报告》(1946年),《工业交通》,第486页。

《工业交通》,第693、725—727页。

米 1215.76 石,纯利润 2948734 元。靖边田保霖合作社运输队 1943 年 10 月向米脂运春毛 750 斤,运回铁锅 19 个,来回 20 天获净利 183000 元;11 月又运春毛 750 斤,交捎牲口 17 头,驮回炉齿 200 条,锅 10 个,获净利 174000 元。庆阳民办运输合作社,1943 年 3 月 20 日至 6 月底,共运盐 8 次,运回食盐 296 驮,加上其它生意,共获纯利 856000 元。许多贫困农民因从事运输业而一跃成为富农,延安的刘永祥土地革命时是贫农,靠给别人赶脚为生。后来加入了南区运输合作社,通过运盐或贩运等成了富农,1943 年时拥有 150 垧山地,20 垧川地,20 多间房子,9 孔窑,6 头牛,80 只羊,1 条驴,3 匹马,雇 5 个长工,安庄稼两户难民,在南区合作社里有 200 多万元的股金。运盐有利可图,定边县的五、六、七区有 80% 的农户都拴起了鞍张,抽空运盐,其中有 20% 的农户由务农转为专靠运盐为生,成为运输专业户。因此,定边的群众如是说:“口袋好像捣金铺,鞭子就是摇钱树。”

四、边区农村的两个明显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边区的农村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

(一) 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

边区有半数农村经历了土地革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获

《南区合作社 1943 年运输业务状况统计表》(1944 年 4 月 1 日),《工业交通》,第 768—769 页间附表。

《田保霖合作社运输队材料》(1944 年 6 月),《互助合作》,第 295 页。

柳可夫:《庆市民办运输合作社》,1943 年 8 月 31 日《解放日报》。

《延安运输队长刘永祥》,《互助合作》,第 307 页。

杨正喜:《定边运输合作的发展》,1944 年 4 月 30 日《解放日报》。

得土地的农民在抗战期间大部分上升为富农或中农了。通过表9,我们可以看出,边区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地主经济被消灭了,而在抗战时期富农、中农的比例比抗战前大大提高了,贫雇农的比例则降低了。而且1941年被调查的几个村子的贫雇农大多数是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难民。

表9 边区三乡土地革命前后阶级关系变化情况的统计

调查地区	各时期实数	总户数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其它
安定四个行政村	革命前实数	173	8	12	10	110	33	
	百分比(%)	100	4.6	7	6	63.4	19	
	1940年实数	228	0	13	126	73	14	2
	百分比(%)	100	0	5.7	55.3	32	6.1	0.9
延川禹居区第三乡	革命前实数	321	12	16	50	204	31	8
	百分比(%)	100	3.8	4.9	15.6	63.7	9.6	2.4
	1940年实数	321	0	22	123	136	15	25
	百分比(%)	100	0	7	38.2	42.6	4.9	7.3
延安中区第五乡	革命前实数	223	8	14	42	103	40	16
	百分比(%)	100	3.5	6.3	18.8	46.4	17.9	7.1
	1940年实数	330	0	34	158	61	40	27
	百分比(%)	100	0	10.6	49.4	19.0	12.5	8.1

资料来源:觉哉:《边区人民生活日趋改善》,1941年9月22日《解放日报》。

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通过减租减息改变了阶级关系。一方面,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农民用赎回、购买等方法从地主手中获得了一部分土地。如绥德杨家塔,13家地主四年中卖出土地619

亩,占地土全数的 37%,有的则卖出其土地的 65%。地主卖地,农民买地,这种土地关系的变化,使许多原来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变成了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另一方面,在租佃法令的保护下,地租被限制在 375%以下,利息被限制在 1 分或 1 分半以下,多年以前的欠租被勾销了。诚如邓小平所言:“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强了。”边区的广大贫雇农积极生产,一部分人摆脱了贫困,上升为中农或富农。可见,边区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二)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抗战前边区农村旧有的手工业破坏殆尽,农村金融枯竭,商业萧条,农村产业结构只有不再向前发展的单一的农业经济了。抗日战争期间,边区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使边区农村呈现出农工商贸运一体化的多元产业结构。首先,在农业结构上,形成了以农作物为主、经济作物并重、农牧兼营的格局。边区恢复和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棉、麻、桑、蓝等。棉花是边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1939 年恢复种植后,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和棉花自给的需要,种植面积不断扩大,1943 年至 1945 年棉田面积分别占耕地面积的 1.1%、2.2%和 2.4%。由此棉花也就成为边区农村的一项主要收入。以 1944 年延安市场物价计算,10 斤棉花值 1.3 石小米,每斤棉花 4500 元(边币),当年的棉花产量是 3044865.2 斤(见前文),这样棉花一项收入就相当于价值 395832 石小米,是 1944 年粮食产量的 21.8%,或等于 137 亿多元(边

贾拓夫:《关于边区土地政策问题的报告》(1945 年 3 月 15 日),《农业》,第 348 页。
《邓小平文选(1938—1965)》,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0 页。

币),折合券币 6.85 亿元。特别在延属、绥德重点植棉区,棉花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半数以上。畜产品在边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羊及其皮毛是边区主要出口货物之一。仅 1944 年就出口羊约 87533 只,羊毛约 88066 斤,羊皮约 29000 张,羔皮 69000 张,总共牲畜皮毛出口价值约在 11 亿元(边币)以上。蚕桑业在抗战时期得到恢复和发展,成为桑蚕地区农村的主要副业。1941 年,清涧、吴堡、安定三县产茧 45000 斤左右,可产丝 3000 斤,价值约 45 万元(法币)。1943 年,蚕桑业发展更快,仅清涧一县有大桑树 27279 株,小桑树 13321 株,新栽 20459 株,全县有养蚕户 4379 户,占全县总户数的 35%,共养蚕 350 石,收茧 30904 斤。

其次,工商业成为边区农村的主要经济部门,形成了农工商贸相结合的产业结构。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农村工商业的兴盛与边区所处的政治经济形势紧密相连,由于国民党的全面封锁,边区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工商业体系,以达到自给的需要。由此,各种手工业合作社、作坊、商业网点、贸易机构、消费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输队等在广大的农村乡镇广泛地建立起来,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农村纺织妇女的收入来计算,1943 年至 1944 年公私产大布约 24 万匹,合纱 280 万斤,每斤纱工资 420 元,农村妇女纺线共收入 117600 万元,以 1943 年 12 月每石小米 19580 元计

边币指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发行于 1941 年 2 月;券币指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发行于 1944 年 7 月,1 边币等于 20 券币。参见拙文《边钞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

《边区羊子的发展问题》(1945 年 2 月),《农业》,第 93 页。

甘露:《蚕桑考察团总结报告》(1941 年 12 月),《农业》,第 155 页。

转引自张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西北大学学报》1981 年第 1 期。

《历年边区工业概况统计材料之一》(估计 1946 年),《工业交通》,第 135 页。

算,折合小米 60061 石。延安南区合作社是边区最典型的综合性合作社,下设生产、运输、消费、脚店、信用、食品、医药等 7 个部门,1943 年获纯利 22843745 元(边币),折合小米 1166.69 石。没有多少工商业基础的三边分区工商业也成为主要经济部门。据 1944 年统计,三边分区有各种手工业作坊 793 家,从业人数 2301 人,分属于皮坊、毛织、油坊三大行业。定边的私营商业有 185 家,分属于 7 个类别(参见表 10)。

表 10 定边私营商业发展状况统计

商业分类	家数	资 本	
		法 币(万元)	折合边币(万元)
栏 柜	61	3961	31688
过载行栈	23	2894	23152
脚 夫 店	28	492	3936
固定摊点	47	740	5920
歇业店铺	6	650	5200
流动摊点	14	647	5176
其 它	6	276	2136
合 计	185	9651	77208

资料来源:三边贸易公司:《三边分区工业调查初步总结》,《工业交通》,第 606 页。

在这 185 家私营商业中,从事对内贸易的 114 家,资本法币 2514 万元,折合边币 21112 万元,占 26.05%;从事对外贸易的 69 家,资本法币 6947 万元,折合边币 56676 万元,占 75%;对内对外

《延安小米与布花交换比例统计表(1937—1945 年)》,《商业贸易》,第 440 页。

《1943 年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及其分社各种业务状况统计》(1944 年 4 月 1 日),《互助合作》,第 391 页。

兼营2家,资本法币180万,折合边币1440万元,占1.95%。陇东农村素无纺织基础,抗战时期家庭纺织业成为主要副业。1940年,有1000多名妇女从事家庭纺织业,1942年发展到4400余人,纺线34000多斤,织布18700余丈。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了工商业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边区的农村经济结构发生着巨大变化,农工商贸易相结合的产业结构已经形成。

五、对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几点认识

最后,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历史地位谈几点认识,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一)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

关于抗战时期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我们主要谈两点。第一,边区农村生产力得到一定的解放,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一切革命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解放生产力,以此来推动社会向进步的方向发展。构成生产力的要素一个是劳动力,一个是生产资料。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正是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解放农村生产力。在劳动力方面,一是通过减租减息重新确定租佃关系,使农民有了固定的可以长期耕种的土地,农村因无土地耕种或因地租过高而不愿耕种地主土地的劳动力不被浪费;二是采用各种劳动组织,把农村劳动力组织起来,提高了劳动效率。在生产资料方面,边区政府采取措施,帮助农民解决或部分解决了土地、农具、耕畜、种子等必需的生产资料。总之,边区政府在农村经济发展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实质都是为了调整农村

《定市商号一般情况》(1944年),《商业贸易》,第379—385页。

《陇东绥德纺织业发展概况》(1943年),《工业交通》,第586页。

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农村生产力解放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二,边区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中,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抗日战争前期,日军企图越过黄河直接进攻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2月至1941年10月,先后发动了数十次对边区的地面攻击和空中攻击,但均被八路军河防部队所粉碎。特别是1939年底至1940年初,120师回师晋西北,建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把日军隔离在同蒲路以东一线,晋西北成了边区的可靠‘屏障’,保证了边区河防的安全。边区也就不再成为直接抗战的区域了。”就在日军进攻边区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对边区进行军事进攻,一时边区形势动荡不安。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受到强烈谴责,使其在政治上日益孤立。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这样,边区在经济最困难的1941年至1942年却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而且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结束。边区政府正是利用这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努力发展农村经济。如果没有1941年至1945年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边区农村经济有如此发展水平是不可能的。

(二)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地位

第一,农村经济的发展满足了群众自给的需要,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一是粮食自给有余。1937至1940年边区采取了“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政策,向农民取之甚少,农村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同时,“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使边区人民的生活大大的改善了,广大的贫苦农民逐渐变为饱食暖衣的农家”。如前文所述,

宋金涛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页。

高岗:《为实现陕甘宁边区新时期施政纲领而奋斗》,《解放》第129期,1941年5月31日。

边区原来的老户中农变富农,贫雇农变中农。边区受到国民党封锁后,外援断绝,财政困难,1941年和1942年政府向群众征粮20.2万石和16.5万石,达到了收获量的13.85%和11.14%,农民的负担有所加重。但与此同时,边区加强对农村经济的领导,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1943年就达到粮食自给有余。当时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说:“四三年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经过数年来的努力,虽未完全达到,但已做到家家有余粮。”如甘泉二区二乡全乡存粮199石,有56户存粮176石。固临康家村1942年54口人,收麦65石,收秋161石,收棉花750斤(折细粮34石),共计179.5石,全年食用110.5石,交公粮15石,余54.5石;1943年收麦子74.2石,收秋169石,收棉花942斤(折细粮45石),共计203.7石,比上年增加24%,全年食用125石,交公粮16石,尚余62.7石,比上年增加15%,做到了耕二余一(耕种二年可供三年需用)。二是工业品达到了自给或半自给。农村手工业的发展,生活用品如布匹、纺织品、生产资料如犁、铧等达到了自给水平。就拿边区最紧缺的布匹来看,在纺织业发达的绥德分区有些家庭达到了自给自足,有些家庭还拿到市场上去卖。如枣林坪乡福乐村,全村45户,全部参加纺织,布匹产量的2/3向外出卖;崔家湾铁如坪有49家纺织户,其中19户可自给,24户有余可卖,仅有6户不足,该村1944年织布1312.2丈,自穿844.2丈,占64.3%,出卖466.2丈,占35.5%,尚存1.8丈。素无纺织基础的关中新宁县

王政新:《陕甘宁边区的粮食工作》,《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270—284页。

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7年),《人民生活》,第58页。

华子扬:《生产大运动与边区人民生活》(1944年8月19日),《人民生活》,第87页。

《工业交通》,第554—556页。

“纺织工业的发展已达到全县穿布自给百分之三十三,有的村庄除全部自给外还有剩余”。除纺织品外,生产资料和其它日用品差不多都是农村自己的作坊生产出来的。三是农村群众的购买力提高了。群众购买力的提高从集市的繁荣就可看出。如关中马栏区“广大群众的购买力已空前提高,仅马栏合作社一家,每日销货在万元以上。马栏镇上,三年前仅有出售粗布、火柴等简单日用必需品的小店铺九家,今则公私商店共十八家,街上小摊贩也很多,购货群众往来不绝。”再从消费水平来看,群众购买力也在不断提高。如延川杨柳村兰风城 1941 年至 1943 年收入分别为 5.413 石、19.939 石、21.307 石,1942 年至 1943 年支出分别为 12.649 石、17.448 石。在延安裴庆乡,1943 年全乡人口比 1938 年增加了 297 人,而人均消费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了 0.28 石,说明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参见表 11)。

表 11 延安裴庆乡 1938—1943 年消费水平统计

年 代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总消费量(石)	330.71	373.77	506.57	508.41	662.63	886.11
全 乡 人 口	240	245	249	383	475	537
平均消费量(石)	1.37	1.52	1.88	1.32	1.39	1.65

资料来源:华子扬:《边区人民生活之介绍》(1944 年 7 月 26 日),《人民生活》,第 135 页。

第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边区政府提供了财政收入。抗战时期,边区财政来源分两个阶段两个不同来源:1937 年至 1940 年,

《已能自给穿布三分之一》,1945 年 1 月 9 日《解放日报》。

《马栏设立集市》,1943 年 10 月 21 日《解放日报》。

任弼时:《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1944 年 4 月),《人民生活》,第 133 页。

外援是边区的主要财政来源,占70%左右;1941年至1945年,税收、特产贸易、国营企业等收入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其中税收的主要来源就是以边区农村工商业发展为基础的。边区正式征税始于1941年,税收种类主要有农业税、工商业税、盐税、公盐代金、牲畜买卖和斗佣,还有烟酒、羊子税等。从1941年至1945年几种主要税收的统计中可以看出,边区农村农工商贸的发展,为边区财政提供了大量的税收(参见表12)。

表12 1941—1945年边区主要税收的统计

年代	农业税 (万石)	工商业税 (万元)	盐税 (万元)	公盐代金 (万元)	牲畜买卖和 斗佣(万元)
1941	20.1	43.3	37.2	700.9	45
1942	16.5	333.0	48.9	3555.7	190
1943	18.4	2408.4	447.1	4521.8	4728
1944	16	11594.3	2457.8	4579.3	8000— 10000
1945	12.4	33714.7	17818.7	8463.9	

资料来源:黄正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第三,农村经济的发展为边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在边

黄正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农业税是边区政府要求农民缴纳的救国公粮。1942年前是以摊派的方式来完成,1943年开始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以每户人口平均收获细粮之多寡为标准分级累进。

严格的说,公盐代金不是税,而是临时捐,是动员群众帮助政府运盐的劳役,其金额较大。

牲畜税是牲畜买卖的一种手续费,征收牲畜价格的5%;斗佣是买卖粮食时代为过斗而征收的手续费,一般征收1%到2%。二者为地方财政来源。

区农村经济发展中,农牧业的发展为边区工业提供了如棉花、蚕茧、蓝、羊毛、羊油、畜皮等原料。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为边区工业提供了半成品。就纺纱一项来看,在边区公私营工业发展中,家庭纺织业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边区经济情况简述》记载:“对边区工业自给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家庭手工业,如全边区四四年有家庭纺织妇十五万人,纺纱一百六十六万余斤……农村的家庭纺纱,不但供给了人民的需要,而且和公私营的纺织工厂相结合,供给后者以原料。”足见,农村经济发展在边区工业发展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综合全文所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促使边区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使边区形成了农工商贸为一体的多元经济结构。农村经济之所以得到发展,根本原因在于边区采取各种措施调整了旧的生产关系,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而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农村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一方面带动了边区其它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为巩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闫庆生、黄正林,甘肃庆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历史系副教授。 西峰 745000〕

【责任编辑:王立新】